

零度控制与镜像场景：公民新闻的透明性叙事

陆佳怡 仇筠茜 高红梅

摘要

以互联网为肇始的一系列新媒体促成了新闻生产由客观性原则转向自证的透明性原则。在几乎所有相关文献都在论述专业新闻的透明性叙事的背景下，本文论述了公民新闻叙事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透明性。它体现在：一、叙述者的透明，即叙述者与聚焦者、行为者三合一，或者是叙述者与聚焦者的二合一；二、叙述声音的透明，即公民新闻（除敏感话题外）的叙述的受控程度为零，其文本则为透明；三、叙事时空的场景镜像化，即公民新闻的视频与图片形式使其叙事时空被镜像化，接近镜子似的反射。最后，本文指出，公民新闻的透明性叙事虽然导致其叙述具有不可靠性，但更有利于公众的理性判断。

关键词

透明性、公民新闻、零度控制、镜像化场景

作者简介

陆佳怡，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邮箱：lujiayi_cuc@cuc.edu.cn

仇筠茜，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邮箱：yunxiqq@cuc.edu.cn

高红梅，中国传媒大学舆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受2019年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是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建设支持科研项目“新媒体语境下新闻报道的嬗变与延续”（项目编号：YLTS180610）的阶段性成果。

Zero control and mirror spectacle: A study on transparency in citizen journalism

LU Jiayi QIU Yunxi GAO Hongmei

Abstract

New media initiated by the Internet have transferred the principle of news product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elf-proved transparency.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inherent transparency of citizen journalism. It finds out that the transparent narrative of citizen journalism can be exhibited

by the transparency of narrator and narration and the mirror spectacle of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It finally argues that the transparent narrative of citizen journalism might bring about unreliability of the narrative whereas it's helpful for rational judgement of the public.

Keywords

Transparency, Citizen journalism, Zero control, Mirror spectacle

Authors

Lu Jiayi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Facult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ujiayi_cuc@cuc.edu.cn.

Qiu Yunxi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Facult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yunxiqq@cuc.edu.cn.

Gao Hongmei is a MA stud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and Double First-rate Fund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YLTS180610).

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基础之上，以互联网为肇始、方兴未艾的一系列新媒体不仅变革了传者和受者的关系，改变了媒介生产样态与图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由此有学者提出用透明性来代替客观性，以适应新媒体的特征（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01/2014：97-98）。“透明性原则这个朴素的观念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恐怕是它天生与互联网的新型开放式架构不谋而合。”（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01/2014：111），所有关于透明性原则的文献可简单归为一点：“新闻是如何获得的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表达。”（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01/2014：118）

对于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简称专业新闻，既包括专业媒体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所发布的新闻，也包括他们在网站、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所发布的新闻）来说，透明性是长久以来被坚持又被诟病的客观性原则在新媒体语境下的补救与自证性策略，是客观性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是互联网开放、互动、共享精神在新闻客观性的体现。针对专业新闻来说，新闻叙事的透明性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新闻文本中呈现事件行为者、相关人员或部门所发布的文字或视频的截图，如《环球时报》公众号的“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这个黑幕绝不能轻易放过！”一文，既有“榆林一院”的“情况说明”及其中的监控录像截图，又有其他专业媒体采访榆林一院医生和护士以及产妇丈夫的视频新闻截图，还有网民微博议论此事的截图。二是在文本中或者文本结尾处直接给予链接跳转。它的透明性显然是为了让受众直接触摸事件人物，从而更接近事件本身，因此是一种叙事技巧。

然而,新媒体尤其自媒体出现后,新闻生产者的外延大大扩展,已不再局限于专业记者。当事人或目击者或相关人员都可生产新闻。他们生产的新闻具有天然的透明性。本文拟就公民新闻的透明性进行论述。

一、文献综述与关键概念

(一) 公民新闻

1998年1月17日,美国人德拉吉对克林顿拉链门性丑闻的率先报道,引发了人们对公民新闻的关注。随着web 2.0自媒体的到来,公民新闻也进入遍地开花的时代,业界与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公民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新闻种类,自然引发众多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如美国新媒体学者马克·格拉泽(Mark Glaser)将其定义为:没有接受过专业新闻训练的普通公众通过新的传播技术并利用网络全球传播的特点来创作新闻信息。其作用既可以为传统媒体增加报道素材,又可以检验和查证传统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报道既可由一个人完成,也可由多人共同完成。而重大事件亲历者的报道,则可能影响整个历史(蔡雯,郭翠玲,2008)。综观这些定义,可发现学者们一般是从生产者、生产过程、生产目的三个角度进行界定的。有的学者认为只要有公民参与生产的新闻就是公民新闻,因此把公民新闻又称为参与式新闻;有的学者认为只有那些完全由非记者,即普通公民(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生产与发布的新闻才是公民新闻,公民作为爆料人等方式参与记者生产的新闻不属于公民新闻。

对公民新闻外延的研究既体现在对公民新闻的类型的划分之上,如申金霞(2013)从政治意义视角把公民新闻分为三类:利益诉求类、探询真相类、社会动员类,而斯蒂夫·奥汀(2008)则从公民参与新闻生产的程度认为公民新闻存在着11种潜在变体;又体现在对公民新闻的源流以及它与其他概念如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等的种属关系的分析之上,如有学者认为公民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的发展与延续(申金霞,2013;范东升,2006)。也有学者认为公民新闻迥异于公共新闻(余建清,2008)。首先,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改革运动,后者始于互联网及其论坛以及自媒体的普及。其次,二者生产主体不同,前者是专业媒体和记者邀请公民参与新闻生产,但新闻生产主体仍为专业记者;后者的新闻生产主体为公民,其生产未被专业媒体和记者染指。同时,有学者认为公民新闻等同于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即凡是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有公民参与的新闻都是公民新闻(奥汀,

2008; 范东升, 2006; Bowman & Willis, 2003)。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公民自主生产的新闻, 即不经过专业媒体编辑、过滤的新闻才是公民新闻(杨保军, 2008a; 杨保军, 2008b; 杨保军, 2008c)。

作为一种在新媒体语境下产生的新闻种类, 公民新闻的传播机制与专业新闻的传播机制自然有显著不同。彭兰(2010)认为公民新闻的传播受到三种机制的影响, 一是公民的社会网络, 二是网民的自组织, 三是网络社区的舆论领袖。

公民新闻甫一出现, 便在很多领域带来了较深影响,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功效。这些影响与功效归根结底在于公民话语权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因此引发了业界与学界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层面对公民新闻展开论述, 包括公民新闻与话语权、言论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阐释, 如有学者指出公民话语权与公民新闻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认为公民话语权催生了公民新闻, 公民新闻的发展促进了公民话语权的实现(张金桐, 郝治丽, 2011), 是公民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的体现(陈丽莉, 2013)。Shayne Bowman & Chris Willis(2003)认为公民新闻因提供了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信息而有助于民主实现; 也包括对公民新闻的赋权与舆论监督作用的论述, 如有学者从赋权的视角论述公民新闻, 认为公民新闻是公民争取权益, 进行抗争和社会动员、建立认同与促进公民行动的途径与渠道(陈楚洁, 2010; 申金霞, 2013), 指出公民新闻是公民实现舆论监督的理想手段, 因为权力机构与权力人物处在无时无刻不在的公民记者的监测之下(姜华, 2013)。当然, 公民新闻对新闻生态、新闻叙事样态的影响则更是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论述, 如杨保军(2008)指出, 公民新闻出现之后, 新闻的社会构成包括两个部分: 民间新闻与职业新闻。曾庆香(2017)则指出, 公民记者的出现导致背书式新闻、对话式新闻、注解式新闻等叙事样态。申金霞(2013)则从情感动员角度指出公民新闻具有三种叙事模式: 受难叙事、对抗叙事与反讽叙事。

总之, 大多数的研究文献都对公民新闻持肯定态度, 也有少部分文献对公民新闻提出了批评, 认为公民新闻过于主观, 严重缺乏客观性(姜欣, 2012; 闫岩, 2015), 公民新闻只是公民参与社会、参与新闻生产的幻象, 而且因为极端或无用而缺乏新闻价值(闫岩, 2015)。

基于以上有关公民新闻的概念及其相关研究, 笔者以为, 公民新闻是普通公民个体或群体、组织机构而非专业记者与媒体自主生产, 并借助一些专门网站、自媒体等渠道自主发布的新闻, 在生产与发布过程中未受到专业媒体与记者的任何编辑。

(二) 透明性

由于新闻生产的后台化，话语建构的选择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主观性，客观性作为维系新闻业专业权威的核心实践原则，从其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与批评。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开放架构与开放文化促使透明、开放的观念在各个领域得到回响，新闻领域也不例外。

新闻透明性最早由新闻业界倡导。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共新闻运动主张新闻业界开放编辑室进行透明性尝试，如邀请读者直接参加报道选题讨论，聘请普通民众审查和评判报纸内容等等。1997年至1999年期间，为增强公信力，美国报纸编辑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ASNE）向新闻界提出一项重要倡议：报纸可以通过将公众纳入到关于新闻业的对话中，向他们解释新闻价值标准以及决策制定过程。2004年，美国阿斯彭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第八届新闻与社会年会发表总结报告《新闻业：透明性与公众信任》（Journalism, Transparency and the Public Trust），呼吁新闻界应该在新闻实践中尽可能地透明（as transparent as practical），并提出增强透明性的四大举措。

在新闻学术界，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与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于2001年最早提出透明性原则。2005年，新媒体学者丹·吉尔摩（Dan Gillmor）更是提出用透明性取代客观性。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有学者从透明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它对客观性原则的延续等视角进行论述，认为新闻的透明性是提高新闻客观性的方法，甚至认为透明性是客观性原则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新表现（夏倩芳，王艳，2016）。但是，大多数文献还是将透明性视为新闻实践操作方法，从新闻实践的操作步骤、具体做法等方面进行阐述。比如，迈克尔·卡尔森（Karlsson, 2010）、李·赫尔姆勒（Hellmueller, 2013）就从具体操作入手对“透明性”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即“透明性”包括“公开的透明性”（discourse transparency）以及“参与的透明性”（participatory transparency），前者指新闻生产者是否公开新闻制作过程，后者指让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克劳斯·梅尔（Klaus Meier）从“过程-文本”“单向-互动”“对自身的覆盖-对新闻的覆盖”三个维度汇总了目前新闻组织常见的“透明性”实践形式，并指出透明性在互联网普及前后即“传统取向”和“数字化取向”的实践操作方法（转引自夏倩芳，王艳，2016）。海基·海克拉（Heikki Heikkilä）等则从“新闻生产前的行动者的透明性”“新闻生产中的过程透明性”“新闻生产后的回应性”三个阶段的透明性具体操作步骤与方法进行了归纳（转引自夏倩芳，王艳，2016）。

此外,还有文献从媒体的公信力视角来对透明性进行检视,认为透明性是提高媒体公信力的重要策略,如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2016)的调查显示,“透明性”已经超过“平衡性”和“表达细致”,而与“准确性”和“完整性”成为影响公众的新闻信任度的三大因素。不过也有学者担心过分的透明反而会削弱媒体公信力(Smolkin, 2006)。还有少数研究从话语修辞视角分析专业新闻的话语的透明性判断与程度(范登侯汶, 201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闻透明性包括从生产前到生产中再到生产后四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体与生产者身份的透明,二是新闻生产过程的透明,三是新闻文本的透明,包括提供消息来源的信息,报道的附加材料、信源材料的链接等,四是受众评论的透明。

无论是将透明性作为新闻客观的实践操作方法,还是作为公信力的策略,透明性文献基本都是从专业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社会化媒体)中的职业人员(即记者)的角度对透明性的操作进行阐释。

(三) 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

媒介的变迁导致新闻叙事的变革。历史上典型案例为电报的产生导致倒金字塔新闻叙事模式的产生。而在互联网、数字化等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新媒体带来了新闻叙事显而易见的变革,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论述。

有学者论述了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的总体特征:互动式、互文式、超文本、非线性和沉浸式(聂志腾, 2012; 王佳航, 2016; 姚静, 2016; 彭柳, 2017; 王强, 2017; 朱瑞娟, 2017)。有学者阐释了叙事主体的变迁,即由单一的媒体工作者(即记者、编辑)到多元的公众+媒体工作者(俞晶晶, 2011; 刘凤园, 2013)。有学者分析了叙事视角的变迁,即由全知叙事视角到多重式人物限知视角,由外视角到内视角(黄雨水, 顾良达, 2012; 刘凤园, 2013)。有学者阐述了叙事手段的变迁,即由单一符号手段到多种符号手段,如由以前的或文字、或图片、或视频、或音频等表达手段到现在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表达手段的全覆盖(黄雨水, 顾良达, 2012; 刘凤园, 2013)。

还有学者梳理了新的新闻叙事结构模式,即由倒金字塔型的新闻叙事模式到蜂巢型新闻叙事模式、菱形新闻叙事模式、钻石型新闻叙事模式、网状新闻叙事模式和橄榄型新闻叙事模式(曾庆香, 2014; 王蓓露, 2015),并且归纳了新的新闻叙事样态,包括背书式新闻、清单式新闻、图说式新闻、对话式新闻、注解式新闻、扫描式新闻、串式新闻、卡片式新闻、数据新闻、新闻游戏和VR新闻(张建中,

2015；曾庆香，侯雪琪，2015；张超，丁园园，2016；姚静，2016；喻国明，谌椿，王佳宁，2017；毛湛文，李泓江，2017；曾庆香，陆佳怡，吴晓虹，2017a；曾庆香，陆佳怡，吴晓虹，2017b）。

综上所述，对公民新闻、透明性、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文献虽然不少，但却未有文献对公民新闻的透明性进行论述，更没有文献对公民新闻的叙事透明性进行论述。

二、叙述者的透明：{[(叙述者=聚焦者=行为者-事件)]}

任何符号叙事对于客观现实来说都是一道屏障。因此，一般来说，人们对事件的符号建构的人数与工序的多少，决定了受众对事件的符号解码节点的多少与繁琐程度，这会对新闻的透明性产生较大影响。

对事件的叙述，其中至少涉及三种角色：一是行为者（用（ ）表示），即事件当事人，因为他们的言行，事件得以发展。因此行为者又可称为亲历者。二是聚焦者（用[]表示），即事件见证者。因为有了他们的见证，有的事件才不至于结束之时便烟消云散，才有可能被人们讲述；有的事件才得以被求证。三是叙述者（用{}表示），指讲述事件并形成文本的人，因为他的讲述，故事才能在受众中得以传播。根据这三种角色的功能，叙事文本的产生层次是：{叙述者[聚焦者（行为者-事件）]}。

在传统媒体的新闻实践中，除非记者碰巧在事发现场或者事件正巧发生在自己身上（如记者被打等），或是策划新闻，不然记者很难成为事件的见证者，更不用说亲历者（除记者被打、暗访之外）。一般情况之下，作为新闻生产者，记者充其量只能充当转述者（用【】表示），即转述“叙述者”的文本，甚至可能是二手、三手、四手转述者，如“美国一水兵南海失踪 所属舰艇曾进中建岛12海里”（赵衍龙，2017）这则对失踪事件报道的新闻，行动者是失踪士兵，聚焦者是“斯特塞姆”军舰的人员，他们把失踪事件报告给美国海军，海军通过声明叙述事件。美国广播公司转述了美国海军的叙述，而中国环球网再转述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环球网-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海军方面称[“斯特塞姆”军舰人员汇报（失踪水兵-失踪）]}】

【环球网综合报道记者赵衍龙】美国广播公司8月1日报道称，美国海军方面称，美国和日本船只和飞机正在南海搜寻一名失踪的美国海军士兵。官方没有公布这

名水兵的姓名。

报道称, 这名水兵隶属美国海军“斯特塞姆”号驱逐舰, 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晨9点左右被报告失踪。美国海军的声明说, 这艘驱逐舰当时正在南海“执行例行任务”。“斯特塞姆”号军舰上的水兵对这艘军舰进行了多次搜索, 试图找到失踪水兵。

美国海军说, 夏威夷人员救援联合中心也在协助搜寻工作。

众所周知, 每个人都会带有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的烙印, 这些烙印就像一面面变形程度不一的镜子, 每个人都是通过这些镜子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审视和叙述。因此, 在新闻报道中, 在受众与事件之间, 插入的角色愈多, 意味着在事件与受众之间插入的镜子愈多, 模糊、变形的程度可能也就愈大, 透明程度也就愈发降低。正是由于对事件的叙述, 多一个人转述, 便多一层障碍, 因此法院要求证人必须是“对案件事实有亲身感受”(江伟, 2004)。“知道部分或全部案件情况。知道案情是指证人直接凭借自己的眼、耳、鼻舌等感觉器官感知案情的人, 这里的感知是直接感知, 而不是听说, 据说等的间接感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12), 即法庭证言必须是陈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而不是转述别人的所见所闻。

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手机移动端的结合使得全民变成记者。人们随时随地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便捷地叙述自己所经历或所见证的事件。因为不需借助专业媒体这一中介发布新闻, 公民作为亲历者即行为者与见证者即聚焦者便可直接对受众发布新闻, 也就成了叙述者, 因此出现了众多的叙述者、聚焦者与行为者三者合一的新闻, 即{[(叙述者=聚焦者=行为者-事件)]}, 如微博网友@郑一诺er所发表的微博“用我血的教训说说杭州、云南、绵阳等地泛滥的福寿螺”(海峡都市报, 2017年8月4日), 这篇微博的博主既是行为者, 也是聚焦者, 还是叙述者。又如下图微博“‘丽江打人抢劫事件’的@琳哒是我”也是三合一:



图一: @琳哒是我



图二: @张晓羊羊

这种三种身份集于一身的新闻让受众直接抵达和触摸行为者, 听他们直接讲述事件。当然, 公民新闻还有不少见证者即聚焦者与叙述者二合一的新闻, 即{[叙述

者=聚焦者（行为者-事件）}}，如图二的博主@张晓羊羊便既是聚焦者又是叙述者。

因为叙述者是行为者或见证者，因此，公民新闻的叙事视角一般采取第一人称内视角和第一人称外视角。

综上，读者对专业新闻叙事的解码层次与过程图示如下：

读者 解读 【记者 转述 {[叙述者 叙述、见证（行为者 经历 事件）} }】



读者对公民新闻叙事的解码层次与过程图示如下：

读者 解读 {[（行为者 叙述、见证、经历 事件）} }



读者 解读 {[聚焦者 叙述、见证（行为者 经历 事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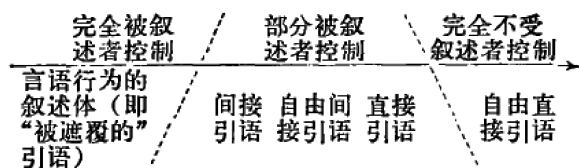
这说明，阅读专业新闻，受众至少需要通过“记者、叙述者/聚焦者和行为者”三重角色、三道屏障，有时甚至经过五、六道屏障才能抵达事件本身。而阅读公民新闻，受众只需通过行为者一道屏障，最多通过见证者和行为者两道屏障便能抵达事件。因此，公民新闻叙事与专业新闻叙事相比，受众与事件之间屏障更少，距离更短。

不过，专业新闻叙事，记者往往会掩饰自己只是转述者或叙述者的身份，而把自己呈现为聚焦者，如大河报新闻“女子用凉水冲奶粉？郑州铁警凭一细节破获贩婴大案”（大河报，2017年8月24日），这篇报道显然只是记者转述乘警刘瑞国对事件的叙述，但文本却把自己呈现为目击者即聚焦者和叙述者。

三、叙事声音的透明：零度控制

叙事声音是叙述者在事件叙述中所传达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意在引导或影响受众对人物和事件的理解和反应。叙事声音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叙述者自己的声音，二是文本中其他人物的声音。

在追求客观的专业新闻实践中，由于叙述者一般不是行为者，也不一定是目击者，因此，新闻常会转述包括行为者、目击者以及相关方，甚至其他媒体的话语。在这些话语引用中，有的是自由直接引语、直接引语，有的是自由间接引语、间接引语，还有的是言语行为的叙述体，即被遮覆的引语。引语的形式不同，叙述者的干涉程度也不一样，具体如下（Leech & Short, 1981: 324，转引自申丹，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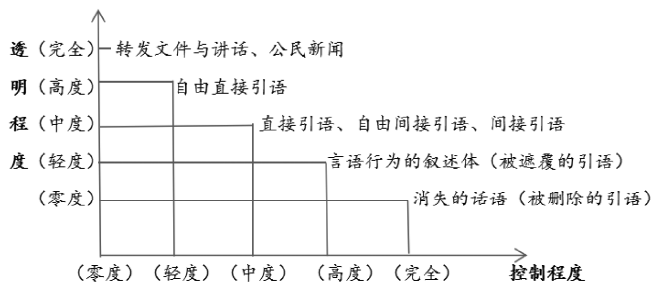


叙述者对相关人物话语不同程度的干涉，意味着不同程度的透明度。在所有形式的引语中，自由直接引语透明度最高，言语行为的叙述体透明度最低。当然，这里引语干涉与透明程度的高低，都只是就被引用的语句即呈现的引语而言。

事实上，在专业新闻中还有两种形式的引语，未在上图得到呈现：一是叙述组织机构的全部文件与组织机构领导人的全部讲话，如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9月1日）。这种形式的话语可认为完全未受到转发者的控制（除了决定是否转发这一点之外），是完全的透明。二是一些人物话语因为过滤与筛选等控制策略而消失于新闻文本之中。相比言语行为的叙述体即“被遮覆的引语”而言，被过滤掉与被筛选的话语，即“消失的话语”，所受到的干涉与控制程度更深，因为它完全被投入到黑暗之中，毫无透明性可言。

总之，就整个专业新闻的文本生产过程与语境来说，首先通过“隐没”与“呈现”两种策略来控制新闻人物的话语是否出现在文本中，即导致两种结果的引语：消失的引语和呈现的引语。其次通过引导词、时态变化、言语特色改变这些显在策略来控制“呈现的引语”的不同形式。最后通过位置安排、引语长短与引用次数等潜在策略来达到调节人物声音大小，通过话轮转换来达到怼回某些人物话语并进而达到消弭某些声音等效果，如3·14事件中，《华盛顿邮报》3月18日的报道“中国总理谴责达赖怂恿骚乱”和3月19日的报道“达赖声明将要辞职”，仅从标题来看，前者传达了中国总理的声音，后者则传达了达赖的声音。这两篇报道看似维持了客观、公正、平衡的专业理念，但细读文章发现，前者中，引用温家宝的话语仅占17%，即便加上支持他意见的引语也仅占47%；而反对他意见的引语则占了33%。后者中，引用达赖话语占29%，加上支持他意见的引语共占92%。因此，前文通过话轮的频繁转换展示了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反对意见，质疑、淹没和消解了中国总理的声音。而后文则通过压倒性优势的引语来呈现达赖的意见无可质疑（曾庆香，2008）。总之，专业新闻叙事受到了作为叙述者或转述者的记者的控制，新闻文本是结构化后的结果。正是这份控制导致常出现新闻人物抱怨或声讨媒体歪曲、误解、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他们的话语的现象。因此，即便最透明的自由直接引语也被人为干涉，存在不透明的因素。

然而，公民新闻（包括各组织机构通过自媒体直接发布的官方新闻），因为没有中介的作用，他们的声音既未被转述，也未被过滤（敏感话题除外），受众看到的便是相关人物未被编辑的原滋原味的话语，文本近乎透明。因此，更准确更完全的新闻事件的叙述的受控制程度与文本的透明程度可图示如下：



四、叙事时空的透明：镜像化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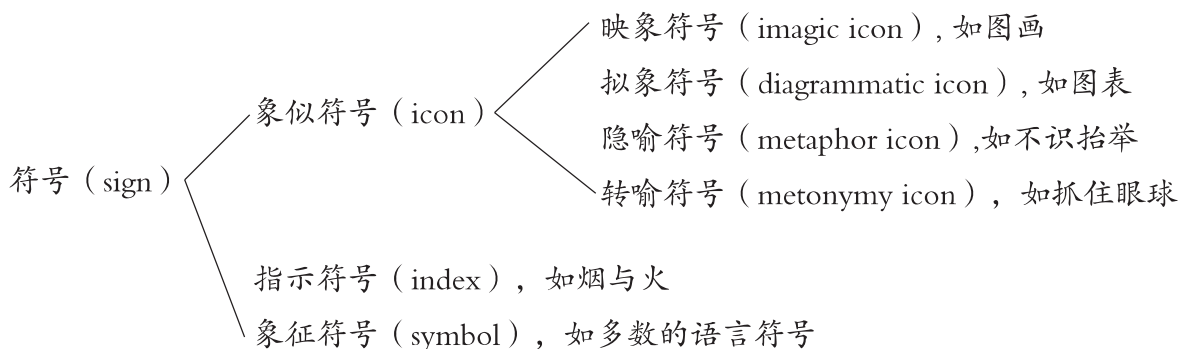
无论是在公民新闻中，还是在专业新闻中，人们总是更青睐于以视频形式呈现新闻。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促进了移动视频的爆发式增长，也使视频新闻由传统电视新闻主导发展到现在移动互联网上百花齐放的局面，视频成为公民表达“我在现场”的有力手段。据《2016微博短视频行业报告》显示：微博短视频的每天发布量达到32万条，播放量峰值达到23亿次，人均播放时常15.2分钟（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6）。另外，公民新闻即便不采纳视频新闻，但一般也会采取多幅图片主导或辅助报道。相比文字符号，视频或图片中的视觉符号更为透明，更能让人真切地触摸到新闻事件。视频或图片新闻的高透明性源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符号来说，视觉符号具有较强的象似性。

美国著名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根据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将符号分为象似符号（icon，有的翻译为肖似符号，符号与所指对象具有相似性）、指示符号（index，符号与所指对象具有存在性关系）、象征符号（symbol，符号与所指对象具有任意性）三种。学者根据相似性的大小，又将肖似符号分为映象象似、拟象象似、隐喻象似、转喻象似等四种符号，图示如下：

显然，从相似性的强弱来说，象似符号的视频与所指对象具有极强的相似，其次依次是照片、图画、图表、隐喻与转喻符号。

视频和照片之所以具有极强象似性，是因为照相机具有与眼睛一样的成像原理。因此未被人为删除或处理的视频与人类自身所看到的场景一模一样，基本与事实相同。因此，以完整视频的形式呈现的新闻具有最强的透明性。



第二，从事件来说，视频、图片使得新闻叙事时空场景化。

大多数新闻是对事件的叙述。因此新闻叙事存在着两个时间：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四种情况（罗钢，1994）：

省略：与故事时间相比，叙事时间为零。

概要：故事时间长于叙事时间。

场景：故事时间等于叙事时间。

停顿：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

一般来说，只有当事件发展本身只表现为对话时，并且用文字对对话进行实录时，这时叙事时间才会等于故事时间。事件其他类型的发展阶段用文字叙述很难真正做到场景，它们在叙事里或被省略，或被概括。如在2017年8月31日的“产妇跳楼事件”中，榆林市第一医院绥德院区的声明是：

2017年08月31日上午10时许，产妇进入待产室。生产期间，产妇因疼痛烦躁不安，多次离开待产室，向家属要求剖宫产，主管医生、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属提出剖宫产建议，均被家属拒绝。最终产妇因难忍疼痛，导致情绪失控跳楼。医护人员及时予以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榆林一院，2017）。

这段短短的话语概述了将近30个小时的事件，叙事时空大大被压缩。省略或概括无疑消除了一些信息。

而未被删除或未被处理的视频、图片展现的都是当时真实时空场景。这种既未加快又未放慢的场景，相比省略、概要来说，无疑更接近事件本身，如“产妇跳楼事件”，当整个视频被发布之后，有不少受众对医院的下跪解读提出了质疑，认可家属的“因疼痛难忍而蹲跪”的解释框架。

第三，从意义来说，原生态的视频与图片所呈现的场景的解释框架未被锚定。

当认知事件场景时，人们倾向于根据自身立场、生活经历、文化原型等等因素对事件场景进行辨认与分门别类，形成自认为正确、合理的解释框架，进而进行叙述，即文字叙述锚定了事件场景的意义，因而往往具有一定的立场与倾向，如上述“产妇跳楼事件”，在医院的第二次声明中虽然公布了“孕妇两次下跪”的场景截图，但由于医院的文字叙述把这一场景锚定为“孕妇向家属跪求剖宫产”的解释框架，从而让许多受众信以为真。事实上，孕妇跪在地上的场景，家属讲述的是因疼痛难忍而跪下休息、缓解，而医院叙述的是跪求家属同意剖宫产。

若非故意做假，与文字叙述相比，视频、图片叙述因其呈现的事件场景的含义未被解释框架固化，受众认知不会被引导，故而这种未被框架化的事件场景更接近现实事件本身，也就更具透明性。

综上所述，若非故意做假，视频与图片比文字具有更高的透明性。因此在有争议的事件中，人们往往最倾向于视频、其次是图片来作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不过，虽然公民新闻和专业媒体都有视频新闻，但专业媒体的视频新闻（包括电视新闻）的透明度同样难如公民新闻，因为专业记者除了碰巧，或策划（譬如奥运会、各种政治会议），或因预测而守株待兔（譬如战争、灾难），很少有机会录制事发当时的现场视频。除了上述三种情况之外，其视频来源于两种途径：事件发生之后对目击者或行为者的采访，即用文字叙述事件；用稿酬收编公民的新闻视频进行报道。虽然如此，无论哪种形式的视频新闻，包括现场直播，专业媒体的视频新闻往往存在叙述者与叙述声音的解读，因此它的视频新闻的透明性增加了“画外音”，就像在视频外增加了一层膜。但大多数公布的公民视频新闻是没有叙述者这层膜，如2017年8月31日的“产妇跳楼事件”的未经解读的原生态的监控录像。

五、叙述的不可靠和受众的理性判断

“新闻客观性”的基本思想是对事实进行准确、中立的报道。因为人、财、物等原因，记者在报道大多数事件时很难身处事发现场，又没时间且不具备专业的侦察能力，只能事后报道事件当事人、目击者、相关部门的叙述，正因如此，在2017年12月20日日本法庭审判书还原事件真相之前，尽管媒体对“江歌案”进行了众多报道，也无法还原事件真相。因此，在专业新闻一统天下的时代，客观性实质上变成了让受众抵达事件相关人物及其叙述的策略。受众只能通过记者对各种叙述的叙述去抵达事件本身。这一追寻事件的过程可图示如下：

受众 → 记者的叙述 → 各种人物的叙述 → 事件

但在新媒体语境里,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人物完全可隔空对话,已不需通过记者来传达话语。基于此,有学者指出,新闻越来越不像是精心准备的演讲,而是更接近于任何人都能自由发言的对话(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01/2014:21)。

这种人与人之间无障碍对话,对于专业新闻来说,客观性便发展出补救与自证措施:把各种人物的叙述进行截图和给予链接。这便成了专业新闻的透明性技巧。因此,专业新闻的透明性不过是提供“这是人物的话语”“我们是诚实”的证据而已。

而对于公民新闻来说,透明性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受众听到的是各种人物的直接叙述,而不是受到记者控制的叙述,甚至直接看到事发场景的镜像。从而真正做到了:将事实叙述出来,结论由读者来做(陈力丹,王亦高,2006)。受众通过各种人物的直接叙述或事件镜像直抵事件,这一过程可图示如下:

受众 → 各种人物的叙述 → 事件

受众 → 事件镜像 → 事件

但公民新闻的透明性促成了其必然采取第一人称故事内叙事视角与第一人称故事外叙事视角,即行为者或见证者作为聚焦者和叙述者。这种叙述视角无疑导致了叙述的不可靠:一是叙述话语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立场偏向,二是只报道己方的一面之词。这种不可靠源于两点原因:第一,作为事件利益方,公民新闻的生产者自然会无意或有意地遮蔽一些事实,突出一些事实,甚至歪曲一些事实,如“产妇跳楼事件”中榆林一院的情况说明,正如“江歌案”中陈世峰和刘鑫的证词。第二,作为没有采访权的公民记者,他们只能报道他们目力所及,视野的有限难免会遮蔽一些事实,从而做出不客观的解释,得出不公正的结论。不少舆论反转事件的出现便源于此,如“大妈‘碰瓷’玩具车事件”,2016年3月23日,微博主@最抽风的视频发布了一则标题为“一个小女孩开玩具汽车不小心撞倒了大妈”的短视频。17秒的视频只记录了老人坐地手扶玩具车与孩子家长理论的场景,因此不少人认定老人为碰瓷,称其“碰瓷新高度”。然而经媒体调查后得知,女孩父母随后将老人送医检查,确诊桡骨骨折,且老人婉拒更多赔偿,并未敲诈(成都商报,2016)。

而专业新闻叙事,记者因为不涉及利益纠葛,且具有采访权,被认为能够做到真实、客观、公正、全面,能够采取具有可靠性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视角。但正如对客观性原则的批判,记者虽然能够跳脱事件之外,但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因为正如曼罗夫所指出,没有人能在转述有关事件的事实时,能够全然公平且客观地看

待这些事实（彭家发，1994：72）。

2015年5月3日“成都男子暴打女司机”事件，在完全了解事件的经过和对比专业新闻与公民新闻的报道可发现，《华西都市报》的客观报道实质上具有明显偏向女司机的立场，其原因在于：一是《华西都市报》主要引用了事件当事人即女司机的讲述，而女司机在讲述中进行了有意隐瞒和撒谎，如“成都男子暴打女司机 数万网友谴责”（华西都市报，2015年5月4日）报道直接引用了女司机对被打原因的解释：“可能转弯的时候有点挡住后头车子的路”。二是记者的价值判断导致不自觉站队，从而不自觉地过滤掉与自己价值判断有矛盾的事实，突显支持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事实，如“女司机变道男司机超车‘2分钟’斗气车升级矛盾”（华西都市报，2015年5月5日）报道根据行车记录仪所制作的事件过程图解，便隐没了女方一再的挑衅行为，其话语转述也未提及男方所遭受的危险。三是报道大量采用叙述体、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三种方式转述了女司机的话语，其后的几次微博也只是及时发布了女方声音；但却基本未对男司机一方进行采访，即便是其中男司机对“暴打女司机”原因的解释：她变道，让孩子受了惊吓，也是通过警察之口转述。

《华西都市报》的立场倾向更一目了然地体现在对“网友谴责”情节的报道之上：当大多数网友谴责男司机时，其报道标题特别提及“数万网友谴责”，而当大多数网友谴责女司机且理解男司机打人心情时，即便有搜狐网的调查结果：21.9万名网友，逾66%的网友不再同情女司机，且理解男司机打人心情，其报道也只字未提（搜狐民调，2015年5月5日）。

当然，专业新闻的确会因为记者是第三方和职业素养而使其思考与叙述更为平衡、客观，如《新京报》的“局面”对“江歌案”的报道，“我们必须保证25条片子……必须给江歌妈妈和刘鑫同样的说话机会。”（王志安，2017）这种因平衡所带来的客观，是建立在记者生产新闻的目的之上，这种目的会影响新闻叙事，即通过删减、组合与强调等策略来对事件进行结构化。如“局面”对江歌案的报道，之所以“给江歌妈妈和刘鑫同样的说话机会”，是为了“避免节目的播出，给本就有着极大不信任的双方，制造额外的伤害”，从而使“这期节目的剪辑花了格外长的时间，期间还曾经彻底推翻最初的结构，另起炉灶。”（王志安，2017）因此，只要专业新闻的平衡与客观，是为了实现其主观动机，这便使事件的叙述戴上了有色眼镜。因此，专业新闻的平衡、客观，反而促成了又一重遮蔽准确事实的屏障，即在当事人叙述的有色眼镜之上又加上一层有色眼镜。

相比之下，在新媒体语境中，公民新闻的叙述的不可靠这一劣势反而转化为优

势：第一，因为受众会本能地对公民新闻的真实性存有疑虑，他们会自动地根据叙述者对事件卷入程度而对所述事件的真假与偏颇进行判断。在这种存疑的情境下，受众往往会根据事件的相关信息，进行深入挖掘论证。正是这种对真相的挖掘论证，导致在“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事件中录制了整个事件经过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被上传到网站，也导致了作为见证者的网民自发地在网上发帖控诉女司机的各种劣迹，如“疑似涉事女司机4年前不文明驾驶行为”和某微信公众号所搜集整理的女司机的劣迹。正是由于网民的参与，导致事件经过了从指责男方到指责女方的舆论反转过程。这一事件过程足以说明：只要事件足够透明（事件完整是透明应有之义），受众便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性进行合理的判断，正如网友对这一事件的总结：

有人总结成都女司机被打：

追了两天被打女司机的新闻，我的心理变化：1.刚开始，觉得男人是人渣不应该打女人。2.男的行车记录仪公布，我觉得女司机有错，但男的下手太重！3.看到女的说那样变道没错，这么多年都这么开车。觉得男的下手轻了。4.看到警察说女的行为罚一百扣三分。觉得把这女的打得对。5.看完她爸妈哥的表演，我觉得有必要这家人都不能在开车上路了（通信连的兵，2015年5月8日）。

试想“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发生在互联网产生之前，由于报警和围观，警察把男司机带走，成都的《华西都市报》因公安局是固定采访线路而得到线索并采访发布“成都男子暴打女司机 数万网友（改为“现场群众”）谴责”报道。报道引用女司机的话语：“可能转弯的时候有点挡住后头车子的路”，再引用警察的话语：她变道，让孩子受了惊吓。其他媒体如果报道，或是直接转发《华西都市报》报道，或者是对其进行改编。于是女司机冤枉、无辜的形象被树立，舆论也不可能反转。

第二，在自媒体时代，透明的公民新闻虽然会导致叙述的不可靠，但在存在双方对峙的事件中，如果一方在互联网上因偏向自己而歪曲事实时，另一方或不赞成的一方一般都会及时进行回应以澄清事实，甚至会有受众对事件进行背景式材料挖掘，以帮助人们对事件进行判断。这足以弥补公民新闻的视线局限和消除其立场倾向的不利影响。

透明性引导受众进行理性判断的机理与客观性原则是一致的。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之所以被人们视为职业伦理：一是相信记者能够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叙述。记者作为人，在面对当事人的具有情感或立场偏向的叙述之时，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看待

事件并进行转述，那么公众在面对同样具有情感热度与利益立场的公民新闻应该也能进行恰当的分辨；二是相信受众有足够的智慧，可根据记者提供的事实进行自主分析和判断，相信受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王晴川，2012），那么作为行为者和目击者的叙事文本所具有的直接立场和情感偏向，受众应该更能拨开立场和情感这些“云雾”，见到事实这个“太阳”。

何况随着新闻实践的发展，客观性原则最后使得“新闻就是权威新闻来源所告诉记者的（News is what an authoritative source tells a journalists）。”（Bell，1991：191）权威新闻来源包括事件当事者。如果说，事件当事人会选择在自媒体通过忽略、突显或歪曲来混淆视听，那么他们自然会选择通过同样的手段来蒙蔽记者以混淆视听。如果说记者作为中介可通过提问来逼迫当事人叙述真相，而不是歪曲事实，显然记者的这份威力来源于其背后的舆论。但事实上，当事人在自媒体发布新闻时，直接面对的便是舆论。因此很难认为，当事人在自媒体发布新闻会歪曲事实，而在面对记者时却会叙述真相。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打定主意要对外隐瞒并歪曲事实，那么无论通过专业媒体还是通过自媒体，他都会这么做。如果记者的提问能够撬开当事人的嘴巴，那么受众或另一方对峙者的提问同样能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当事人害怕的并非记者，而是记者背后的舆论以及随之而至的职能部门的处罚。正如“江歌案”，对于“刀具的来源”和“有无锁门”的问题，陈世峰和刘鑫在法庭面对法官都能说假话做假证，能指望他们在记者面前说真话吗？

因此，虽然更具透明性的公民新闻叙述具有不可靠性，但它并不比专业新闻更影响人们的理性判断。因为专业新闻不着痕迹地利用平衡而偏向另一方，且又素有“客观、真实”招牌，可能更容易让受众相信事实是经过多方核实，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相，从而在消费事件的同时消费其中的价值观念。

总之，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叙事及其声音越透明，便越能激发受众核实事实，订正错误，事情真相也便越发清晰。

六、讨论

当然，在现实社会中，公民新闻的透明性叙事的不可靠未必一定会被人所认知，原因有：一、在现实社会的场域中，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资本的公民新闻因其裹挟的资本分量的不同，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如“产妇跳楼事件”，产妇丈夫与榆林一院因在现实中实力悬殊，导致各自的事件叙述得到的认可度不同。二、事件的见证者因利益、时间、麻烦等种种原因，造成未必有公正之心，如果其中的一个关

键见证者不主动参与通过公民新闻叙述事件, 准确的事实便难以昭白天下。相比之下, 专业媒体可能拥有更多资源逼迫这些关键见证者面对和叙述事件, 如“产妇跳楼事件”主治医生和相关护士在众声喧哗的公民新闻阶段一直未直面叙述, 直至专业媒体介入。

不过, 在互联网尤其是自媒体出现之后的现实社会, 许多事件真相的最后揭露, 的确是由公民新闻的透明性叙事所推动。

(责任编辑: 吴欣慰)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保罗·范登侯汶(2016)。批判修辞: 一种新闻透明理论。《全球传媒学刊》, (4), 83-96。
- 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蒂尔(2001/2014)。《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刘海龙, 连晓东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蔡雯, 郭翠玲(2008)。从“公共新闻”到“公民新闻”——试析西方国家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变化。《新闻记者》, (8), 43-46。
- 陈楚洁(2010)。公民媒体的构建与使用: 传播赋权与公民行动。《公共管理学报》, (4), 111-121/128。
- 陈力丹, 王亦高(2006)。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读《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新闻大学》, (1), 8-10/16。
- 陈丽莉(2013)。论自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中国检察官》, (8), 39-42。
- 成都商报(2016)。大妈被#玩具车撞后坐地不起#后续: 大妈确诊骨折 没有碰瓷。检索于<https://m.weibo.cn/1700648435/3956508028869902>。
- 大河报(2017年8月24日)。女子用凉水冲奶粉? 郑州铁警凭一细节破获贩婴大案。检索于<http://news.dahe.cn/2017/08-24/108512766.html>。
- 范东升(2006)。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国际新闻界》, (1), 60-63。
- 海峡都市报(2017年8月4日)。姑娘蜜月旅行时误食福寿螺 半年后被迫流产。检索于<http://society.firefox.sina.com/17/0804/12/SFR42HLZ86JQ5AI7.html>。
- 韩鸿(2006)。论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共享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 (3), 73-79/96。
- 华西都市报(2015年5月4日)。成都男子暴打女司机 数万网友谴责。《华西都市报》, 检索于<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50504/000560574.html>。
- 华西都市报(2015年5月5日)。女司机变道男司机超车 “2分钟”斗气车升级矛盾。《华西都市报》, 检索于<http://wccdaily.scol.com.cn/shtml/hxdsb/20150505/284387.shtml>。
- 黄雨水, 顾良达(2012)。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叙事创新。《新闻传播》, (6), 141-

142。

姜华(2013)。公民新闻及其民主监督作用初探。《国际新闻界》，(4)，38-46。

江伟(2004)。《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姜欣(2012)。浅析公民新闻视阈下的新闻客观性。《前沿》，(15)，122-125。

刘凤园(2013)。微博新闻的叙事学研究。广州大学硕士论文。

罗钢(1994)。《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毛湛文，李泓江(2017)。“融合文化”如何影响和改造新闻业——基于“新闻游戏”的分析及反思。《国际新闻界》，(12)，53-73。

聂志腾(2012)。刍议网络新闻的叙述模式。《新闻爱好者》，(5)，35-36。

彭家发(1994)。《新闻客观性原理》。台湾：三民书局。

彭兰(2010)。影响公民新闻活动的三种机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8-47。

彭柳(2017)。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叙事及文本特征。《编辑之友》，(11)，57-60。

人民日报(2017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人民日报》，2。

申丹(1991)。小说中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1)，13-79。

申金霞(2013)。自媒体时代的公民新闻。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斯蒂夫·奥汀(2006)。公民新闻：一种全新的尝试与冲击(赵俊峰，张羽，朱浩林编译)。《今传媒》，(3)，19-22。

搜狐民调(2015年5月5日)。女司机变道别车挨打 66%网友：理解打人者窝火。检索于<http://news.sohu.com/20150505/n412416128.shtml>。

申丹(1991)。小说中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1)，13-79。

通信连的兵(2015年5月8日)。女司机变道男司机超车 “2分钟”斗气车升级矛盾。检索于<http://coral.qq.com/1154652876>。

王蓓露(2015)。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模式。《新闻研究导刊》，(16)，78+85。

王佳航(2016)。叙事变迁：技术驱动下的新闻表达重构。《新闻与写作》，(6)，9-12。

王强(2017)。“数码受众”与“数字叙述”：新媒体叙述范式的建构。《当代文坛》，(5)，47-51。

王晴川(2012)。自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反思。《上海大学学报》，29(6)，128-138。

夏倩芳，王艳(2016)。从“客观性”到“透明性”：新闻专业权威演进的历史与逻辑。《南京社会科学》，(7)，97-109。

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6)。《微博短视频行业报告》。检索于<http://data.weibo.com/report/>

reportDetail?id=342.

闫岩(2015)。公民新闻:参与的幻象。《新闻与写作》,(6),57-62。

杨保军(2008a)。简论“后新闻传播时代”的开启。《现在传播》,(6),33-36。

杨保军(2008b)。简论网络语境下的民间新闻。《新闻记者》,(3),20-23。

杨保军(2008c)。新闻的社会构成:民间新闻与职业新闻。《国际新闻界》,(2),30-34。

姚静(2016)。新闻游戏: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性新闻叙事模式。《传媒》,(15),72-74。

喻国明,谌椿,王佳宁(2017)。虚拟现实(VR)作为新媒介的新闻样态考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5-21。

喻国明,张文豪(2016)。VR新闻:对新闻传媒业态的重构。《新闻与写作》,(12),47-50。

俞晶晶(2011)。新媒体时代新闻叙事学下叙述的嬗变。《东南传播》,(8),76-77。

余建清(2008)。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辨析。《国际新闻界》,(7),58-61。

榆林一院(2017)。关于产妇马XX跳楼事件有关情况的说明。检索于<https://m.weibo.cn/5708110926/4147846653826793>。

张超,丁园园(2016)。新闻业的沉浸偏向:VR新闻生产的变革、问题与思路。《中国出版》,(17),38-41。

张建中(2015)。从信息流到信息库:卡片化新闻报道。《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3),47-51。

张金桐,郝治丽(2011)。从公民话语权看公民新闻的发展。《新闻爱好者》,(21),40-41。

曾庆香(2008)。西方某些媒体“3·14”报道的话语分析。《国际新闻界》,(5),25-31。

曾庆香(2014)。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叙事模式。《新闻与传播研究》,(11),48-59。

曾庆香,高红梅(2018)。串式新闻:一种社交媒体的新闻样态。《新闻爱好者》,(1),67-69。

曾庆香,侯雪琪(2015)。数据新闻:社会精英话语权的消解。《探索与争鸣》,(3),83-86。

曾庆香,陆佳怡,吴晓虹(2017a)。两极与互补: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样态与图景。《新闻记者》,(8),43-51。

曾庆香,陆佳怡,吴晓虹(2017b)。数据新闻: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新闻的论证。《新闻与传播研究》,(12),79-91。

赵衍龙(2017)。美国一水兵南海失踪 所属舰艇曾进中建岛12海里。环球网。检索于<http://>

- news.cyol.com/content/2017-08/02/content_16353476.htm.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检索于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2-11/12/content_1745518.htm.
- 朱瑞娟（2017）。融媒体时代新闻叙事研究的路径衍变。《青年记者》，（13），45-46。
-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A new understanding: What makes people trust and relay on news, <https://www.Americanpress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ports/survey-research/trust-news/2016.4.20>.
- Bell, A.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UK: Blackwell.
- Gillmor, D. (2004).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CA: O'Reilly Media.
- Hellmueller, L. & Vos, T. P. & Poepsel, M. A. (2013). Shifting journalistic capital? Transparency and o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ism Studies*, 14 (3), 287- 304.
- Leech, N. G. & Short, H. M. (1981).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London, UK: Longman.
- Karlsson, M. (2010). Rituals of transparency: Evaluating online news outlets' uses of transparency ri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Sweden. *Journalism Studies*, 11 (4), 535-545.
- Smolkin, R. (2006). Too transparent?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28 (2), 17- 23.